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 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



袁 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 要:将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有关。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生业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ubsistence of the Neolithic and Bronze age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parts of Northeast China is summarized in the long-term way. The subsistence in the north part was characterized by hunting, fishing and gathering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the importance of plant cultivat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gradually increased since Bronze Age. While in the south the occurrence of small-scale plant cultivation, probably with animal domesticatio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8000 BP at the latest. After that,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ed slowly in Yanshan mountain area in Neolithic while gradually turned to be primary lifestyle in the southern Liaodong peninsula. In Bronze Age, Gaotaihan culture in lower Liaohe river catchments mainly relied on millet farming and pig raising, complemented by hunting and fishing. 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in Xiliaohe river catchment was characterized by millet farming and pig raising, while the great amount of sheep and cattle bones uncovered indicated the occurrence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steadily developed from the Upper Xiajiadian culture to Yan culture period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replacement of the specific local archaeological culture which is also limi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ed by the farming culture from the Yellow River area.

Key words: The Neolithic period; Pre-Qin period; Northeast China; subsistence

迄今为止,围绕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生业特征进行探讨的实例不多。有鉴于此,我们计划聚焦这个方面开展系列研究,由于从全国范围看,秦汉以来的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均不多,且那些成果所属的时代分布也不均,不宜开展系统的探讨,所以这里把时间跨度限定在自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本文围绕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包括东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生业状况开展探讨。首先阐述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这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然后介绍迄今为止动植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此

基础上探讨当时的生业状况及相关问题。

一、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探讨生业状况的时空框架,这里主要参考赵宾福的研究成果,本着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顺序依次排列各个区域,对每个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依早晚顺序进行大致的归纳。

(一)嫩江流域

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年)、鞍山类型(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

年)、昂昂溪文化(约公元前 2500~公元前 2000 年)。青铜时代有白金宝文化(西周至春秋时期)。

(二)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

新开流文化(约公元前 5500~公元前 4550 年)、小南山文化(约公元前 4500~公元前 4000 年)。

(三)牡丹江流域

振兴文化(约公元前 4500~公元前 4000 年)、亚布力文化(约公元前 4000~公元前 3500 年)、莺歌岭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000 年)、石灰场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2500~公元前 2000 年)。

(四)松花江流域

左家山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5000~前 4500 年)、左家山中层文化(约公元前 4500~前 4000 年)、左家山上层文化(约公元前 3500~前 2500 年)。青铜时代有西团山文化(西周至战国时期)^④。

(五)辽河下游地区

新乐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5500~前 4500 年)、偏堡子文化(约公元前 3000 年左右)^⑤。青铜时代有高台山文化(距今 3700~3000 年)^⑥。

(六)鸭绿江口及千山东麓地区

后洼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4500~前 4000 年)、后洼上层文化(约公元前 3500~前 2800 年)、北沟文化(约公元前 2700~前 2000 年)。青铜时代有马城子文化(公元前 1800~前 1100 年)^⑦。

(七)辽东半岛南端地区

小珠山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5000~前 4500 年)、小珠山中层文化(约公元前 4000~前 2500 年)、小珠山上层文化(约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⑧。

(八)燕山南北地区

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 6000~前 5000 年)、上宅文化(约公元前 5500~前 4500 年、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富河文化(年代与赵宝沟文化基本相同、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赵宝沟文化(约公元前 5000~前 4700 年、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红山文化(约公元前 4500~前 3000 年、主要分布于老哈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小河沿文化(约公元前 3500~前 3000 年、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⑨。青铜时代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 2000~前 1400 年)、魏营子文化(年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主要分布于大凌河流域)^⑩、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为商周之际到春秋中期)、水泉文化(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主要分布于努鲁尔虎山以东地区)、燕文化(春秋晚期至战

国晚期)^⑪。

二、动植物考古研究

这里按照上述的自然区域阐述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牡丹江流域尚未开展相关研究,这里没有列入。另外,如果一个遗址中同时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研究,则先介绍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再介绍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全面开展工作,则分别介绍植物考古学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还有,鉴于个别的动物考古研究结果有待商榷,本文在应用时有所选择。

(一)嫩江流域

这个区域仅对黑龙江省肇源县白金宝遗址属于青铜时代的文化层开展过动植物考古学研究。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 3700~2900 年,相当于西周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发现 6 粒植物种子,其中 3 粒为黍,是农作物,还有 1 粒为藜属,其他不明^⑫。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瓣鳃纲有剑状矛蚌和背角无齿蚌 2 种;硬骨鱼纲有鲶鱼、乌鳢和鳊鱼 3 种;鸟纲有疑似鹌鹑的大型鸟 1 种;哺乳纲有狗、马、猪、马鹿、东北狍、黄牛和山羊等 7 种,确认的家养动物仅有狗。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 20%,野生动物占 80%,以野生动物为主^⑬。

这个遗址在青铜时代已经存在农作物和少量家畜。

(二)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

这个地区仅对属于新开流文化的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开展过动物考古学研究,遗址年代为距今 7500~6500 年左右。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腹足纲有平卷螺 1 种;瓣鳃纲有种属不明的 2 种;硬骨鱼纲有鲑鱼、鲤鱼、青鱼和鲶鱼 4 种;爬行纲有鳖 1 种;鸟纲有种属不明的 1 种;哺乳纲有鼠、狼、狐、棕熊、狗獾、种属不明的奇蹄目、野猪、马鹿、鹿和狍等 10 种^⑭。另外,在新开流遗址中发现 10 座鱼窖,内有层层相叠的鱼骨^⑮。

这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完全通过渔猎方式获取野生动物。

(三)松花江流域

这个地区仅对属于左家山文化下层至上层的吉林省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开展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瓣鳃纲有剑状矛蚌、圆顶珠蚌、背角无齿蚌 3 种;硬骨鱼纲有鲤鱼和鲶鱼 2 种;爬行纲

有鳖1种;鸟纲有鸭和鸡2种;哺乳纲有鼯鼠、狼、狗、沙狐、狐、貉、豺、紫貂、貂熊、獾、水獭、野猫、虎、马、野猪、家猪、麝、獐、马鹿、梅花鹿、狍和黄牛等22种。狗和家猪是家养动物。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结果,在左家山下层文化,猪等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数的17%,鹿科等野生动物占83%。左家山文化中层,猪等家养动物占6%,鹿等野生动物占94%。左家山文化上层,猪等家养动物占19%,鹿等野生动物占81%^⑥。

在这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渔猎活动一直占据主要地位。

(四) 辽河下游地区

这个地区有两处遗址开展过动植物考古学研究。如辽宁省彰武县平安堡遗址包括三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时代,均有动物遗存出土。其中第二期遗存的年代约为距今4400年,第三期遗存(青铜时代)的年代约为距今3700~2900年。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除发现少量蚌壳之外,鸟纲有鸡1种;哺乳纲有东北鼯鼠、狗、鼬、獾、家猪、马鹿、狍、牛和羊等9种。狗、家猪和牛是家养动物。研究者未对动物遗存进行统计,仅认为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以家养动物为主^⑦。

属于青铜时代的高台山文化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三家子遗址的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结果确认,谷粒(以粟为主,也包括黍)约占全部植物种子的61%。动物种类有贝类、鱼类及狗、猪和牛等家养动物^⑧。

这两个遗址证明,至少在青铜时代的生业活动中存在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的方式。

(五) 鸭绿江口及千山麓地区

在这个地区仅有辽宁省本溪市马城子遗址开展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在距今约5000年的马城子B洞下层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鱼类有种属不明1种;爬行纲有鳖1种;哺乳纲有狗和狍2种,狗为家养动物,渔猎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属于青铜时代的洞穴墓葬中发现动物遗存较多,在时代相当于夏初的马城子B洞墓葬中,鸟纲有鸡1种;哺乳纲有狗、野猪、家猪和羊4种,鸡、狗、家猪和羊等为家养动物;在时代相当于夏初的北甸A洞墓葬中哺乳纲有狗、家猪、鹿和羊4种,狗、家猪和羊等为家养动物;在距今约3900~3100年的张家堡A洞墓葬中,哺乳纲有家猪、鹿和狍3

种,家猪为家养动物;在距今约3800~3000年的山城子C洞墓葬中鸟纲有鸡1种;哺乳纲有狗、家猪、獐和鹿4种,鸡、狗和家猪等为家养动物;在距今约3600~3300年的山城子B洞墓葬中哺乳纲有家猪和鹿2种,家猪为家养动物;在距今约3000年的马城子A洞墓葬中,鸟纲有鸡1种、哺乳纲有狗、野猪和家猪3种,鸡、狗和家猪等为家养动物;在距今约3000年的马城子C洞墓葬中,鱼类有种属不明1种;鸟纲有鸽和鸡2种;哺乳纲有狗、野猪、家猪、鹿和羊5种,鸡、狗、家猪和羊等为家养动物;在青铜时代的洞穴墓葬里发现随葬动物的下颌,其中以猪下颌的数量最多,其他还有狗和鹿^⑨。

从这个遗址中可以看到,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由新石器时代以渔猎活动为主发展到青铜时代以饲养家畜为主。

(六) 辽东半岛南端地区

在这个地区有3处遗址开展过动物考古学研究。如辽宁省大连市北吴屯遗址包括小珠山下层及中层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6500~5500年左右。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腹足纲有脉红螺1种;瓣鳃纲有长牡蛎、僧帽牡蛎、密鳞牡蛎、文蛤、青蛤和蜃蛸等6种;硬骨鱼纲有鲟鱼1种;爬行纲有鳖1种;鸟纲有鸢1种;哺乳纲有猴、鼯鼠、貉、种属不明的犬科、棕熊、鼬、獾、虎、象、马、家猪、梅花鹿、狍和牛等14种。家猪是家养动物,研究者对动物遗存未做统计,仅提到猪骨和牙齿的数量最多^⑩。

辽宁省大连市郭家村遗址包括小珠山中层及上层文化,年代为距今5780~4300年左右。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腹足纲有盘大鲍、锈凹螺、嵯螺、红螺、疣荔枝螺、纵带锥螺和扁玉螺等7种;瓣鳃纲有魁蚶、贻贝、僧帽牡蛎、大连湾牡蛎、青蛤、蛤仔和白笠贝等7种;哺乳纲有黑鼠、狼、狗、貉、熊、獾、野猫、豹、家猪、麝、獐、鹿、梅花鹿、马鹿和狍等15种。狗、家猪是家养动物,研究者未做定量统计,仅提到猪骨在全部哺乳动物遗存中占半数以上^⑪。

辽宁省大连市大嘴子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年代为距今4000~3100年左右。在遗址的陶罐中发现炭化的稻米,可能为粳稻^⑫。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腹足纲有锈凹螺、朝鲜花冠小月螺、古氏滩栖螺、微黄镰玉螺、脉红螺、黄口荔枝螺和润泽角口螺等7种;瓣鳃纲有魁蚶、大连湾牡蛎、密鳞牡蛎、菲律宾蛤仔和砂海螂等5种;硬骨鱼纲有鲟目、鮫鱈目、鲈形目、鲭

亚目等4类;哺乳纲有狗、貉、猫、家猪、麝、獐、梅花鹿、马鹿、豹和海豚等10种。依据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结果,狗、家猪等家养动物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81%,鹿科等野生动物约占19%,以家养动物为主²³。

这个地区至少从小珠山中层文化开始,家养动物的数量大致占据全部动物的半数以上,到青铜时代家养动物的数量占据绝大多数,同时还发现存在农作物。

(七)燕山南北地区

这个地区可以按照文化序列阐述生业状况。

1. 兴隆洼文化

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年代为距今8000~7500年左右,发现炭化植物种子以杂草类为主,主要以石竹科的豆须卷耳、豆科的黄芪为主,还有苋属和藜属,另外还发现黍和粟,占全部植物种子的15%以上,其中又以黍占绝大多数,第一地点的黍保留了较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²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层发现的动物有狼、狐、熊、马属、野猪、梅花鹿、马鹿、豹、野牛及蛙类、鸟类和贝类等。均为野生动物,当时以渔猎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²⁵。

2. 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

这个遗址尚未归入具体的文化,其年代为距今7900~7600年左右。这个遗址发现山杏、核桃楸、榛子和一些禾本科、豆科炭化植物遗存,说明采集可能是获取植物性食物的主要方式,目前没有发现农作物的证据²⁶。

3. 红山文化

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址有4处开展过动植物考古研究,如(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距今约6000年左右。发现作为农作物的粟和黍,总数为所有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50%,其他可鉴定的有猪毛菜、紫苏、狗尾草属、藜属、黄芪属、茄科等科属的植物。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粟和黍的形状与现代粟和黍的基本一致,说明出土的粟和黍应该属于已经完全栽培的农作物,但是其数量有限²⁷。(2)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年代为距今5300~5000年左右,发现的植物遗存数量较少,有蔷薇科的杜梨、欧梨和山杏,壳斗科的橡树,榛科的榛子,胡涛科的山核桃等,也发现少量的黍和粟²⁸。(3)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左右。动物考古学研究确认,瓣鳃纲有

蚌科未定属种1种;鸟纲有雉1种;哺乳纲有梅花鹿、豹、獐、野猪、狗、黑熊、狗獾、野兔、东北鼯鼠等9种。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家养动物仅有狗,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4%,其他均为野生动物,约占96%²⁹。以野生动物为主。(4)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白音长汗遗址红山文化层发现的动物有野兔、狼、狗、狐、熊、狗獾、马属、野猪、梅花鹿、马鹿、豹、野牛及蛙类、鸟类和贝类等。家养动物仅有狗,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2%,其他均为野生动物,约占98%³⁰。以野生动物为主。

4. 夏家店下层文化

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有5处开展过动植物考古学研究,如(1)辽宁省凌源县城子山遗址,年代为距今3700~3550年间,发现黍和粟,但粟的数量为黍的3倍左右,说明粟在农业生产中占有较高的种植比例³¹。(2)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沟遗址第三地点,年代为距今4000~3500年左右。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以农作物籽粒为主,包括有粟、黍和大豆三个品种,占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9%。出土的其它植物种子有欧李、猪屎豆属、豆科和藜科等,以及少量的未知植物种子在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中,炭化粟粒的出土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炭化黍粒的出土数量相对较少。这两种谷物出土数量合计所占的比例,在农作物籽粒总数中高达99.9%³²。(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三座店遗址,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发现出土的植物种子基本上都是农作物遗存,包括有黍、粟和大豆三个品种,占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99.9%。其它植物种子的出土数量较少,仅发现38粒,经鉴定,大多数属于禾本科,包括有黍亚科和早熟禾亚科的植物种子,以及属于黍亚科的狗尾草属和稗属植物种子。另外,还发现有3粒豆科植物种子³³。(4)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确认出土的农作物种子有粟、黍、大豆和大麻等4个品种。其中粟占植物种子总数的73%左右,黍占16%左右,大豆和大麻均不到1%。粟和黍的出土概率均很高。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除农作物之外,还发现较多的杂草种子,说明当时的耕作和收割技术还是比较粗放的³⁴。(5)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层中发现哺乳纲动物有狗、马、猪、豹、鹿、牛和羊,狗、马、猪、牛和羊等家养动物占据绝大多数,家养动物中猪的比例没有超过50%,牛和羊的比例超过40%³⁵。

5. 夏家店上层文化

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有3处开展过动植物考古学研究,如(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机房营子遗址,年代为商周之际到春秋中期,发现粟类作物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还发现少量麦类^⑤。(2)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夏家店遗址,年代在距今2750~2360年间,发现大量粟和黍等农作物遗存,黍与粟的数量相当,但黍在剖面中的出现频率大于粟,似乎表明当时对黍的种植和利用可能要多于粟^⑥。(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层中发现哺乳纲动物有狗、马、猪、马鹿、牛和羊,狗、马、猪、牛和羊等家养动物占据绝大多数,其中猪的比例没有超过60%,牛和羊的比例接近25%^⑦。

这里还要提及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的研究结果,由于研究者把该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遗存放在一起报告,这里仅能说在这两个文化时期,家养动物占据全部哺乳动物的绝大多数,其中猪的比例没有超过50%,马、牛和羊的比例超过30%^⑧。

6. 燕文化

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山前遗址燕文化层做过工作,发现哺乳纲动物有猪、牛、羊、狗、马、马鹿、熊、獾和鹿,猪、牛、羊、狗、马等家养动物占据绝大多数,其中猪的比例没有超过50%,牛、羊和马的比例接近40%^⑨。

这个地区获取食物资源的方式可以分为在距今约7000年之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出现少量的黍与粟,但有的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遗址没有发现农作物。当时主要是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到红山文化时期,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种植在当时尚未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表现出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以饲养家畜为主,其中牛和羊的比例接近40%。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延续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同样以饲养家畜为主,但是牛和羊的比例仅为25%左右。到战国时代的燕文化时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饲养家畜为主,其中马、牛和羊的比例接近40%。

三、相关人工遗物的探讨

依据相关人工遗物的科学研究对生业活动进行探讨是研究生业状况的重要方法。但是,鉴于在研究

红山文化的生业状况时,主要依赖石器形状的分析进行探讨,其认识与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结果明显不符的事实^⑩。相比之下,李水城从农作物、家畜和石器这几个方面的探讨,认为渔猎—采集在红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中仍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⑪。可见仅仅凭借对各类石器的形状推测用途及当时生业状况的思路和方法尚需进一步完善。但是,有学者依据新开流文化中以石镞为主的细石器和骨鱼镖、骨刀梗和骨枪头等骨器的比重较为显著,推测当时的渔猎活动十分活跃。而对这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也证实,当时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渔猎活动。可见依据此类细石器和骨器的研究,推测当时生业状况的方法是比较可行的。这些器物发现于嫩江流域、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多个考古学文化中^⑫,由此可以推测渔猎活动在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不同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立新在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吸收了兽首刀、动物牌饰、马衔和马镡等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因素,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生业中畜牧业特征较为明显^⑬。

战国时期在西辽河流域的遗址中发现的镰、锄、铲和犁等铁农具,则是当时存在农业生产的铁证^⑭。

以上的探讨尽管远远不够系统和全面,但是其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渔猎活动的普遍性及夏家店上层文化和燕文化时期的农业和畜牧业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生业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 生业特征

赵宾福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生业方式分为南部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北部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⑮。本文在此基础上,将整个东北地区的生业状况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即属于北部地区的嫩江流域、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松花江流域、鸭绿江口及千山东麓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比重逐渐增加,但其具体发展状况尚有待于研究;而属于南部地区的辽河下游地区、辽宁半岛南端和燕山南北地区则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出现饲养家畜的行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

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生业特征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可能加大了畜牧业的比例^⑦。到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

(二) 自然环境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地貌环境在整体格局和基本特征上与今天并无二致。东北地区略呈半环状的三个带,最外一环是黑龙江、乌苏里江、兴凯湖、图们江和鸭绿江等流域低地;紧接着是山地丘陵地;山地丘陵地内则是广阔的平原,平原内湿地、沼泽和湖泊较多;其自然植被为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以及草甸草原为主。西辽河流域位于连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其河流谷地和冲积平原上分布有厚层的次生黄土;地势较高的山地以森林为主,平原地区为草原植被,森林植被以落叶栎属和松属为主,还有榆属、桦属和胡桃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植物。其中西辽河上游地区属于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向松辽平原草甸草原区过渡地带,当地属于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⑧。

通过对黑龙江省伊春沼泽剖面、黑龙江省同江市勤得利农场沼泽剖面和河北省怀来盆地太师庄泥炭剖面的孢粉分析,可以大致认识较长时间段里的气候状况及变迁。东北地区的气候在距今8000年以来,曾经出现过由寒冷湿润向温暖湿润的转变,到距今4000~3000年以来,再次转变为寒冷干凉。另外,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的气候呈现出冷湿的特征^⑨。

上述这些基本的自然地貌、植被和气候特征决定了东北地区虽然具备广阔的平原和草原,其中湿地、沼泽和湖泊较多,从整体上看属于较好的自然环境,但是其漫长、寒冷的冬季则限制了在这个地区生长的动植物种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古代人类的活动及发展,在北部地区这种影响表现的相当明显。另外,在西辽河流域还存在范围广阔的生态脆弱地区,属于农牧交错带,多位学者指出,由于西辽河流域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容易波动,地表草皮较薄,土壤脆弱,在超强度的农业耕作方式下,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和沙化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衰落,很可能是

由于过渡耕作叠加气候与环境变迁的结果^⑩。这个认识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而这个地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以来,在推广农业的基础上,畜牧业逐步发展,应该与这个地区的气候、地貌及植被特征相关。可见在特定地区,自然环境对于生业特征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 文化状况对生业特征的影响

东北地区的这种生业状况和这个地区内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如前文指出的,赵宾福对位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遗址进行过认真的梳理,另外,李水城对位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及遗址也进行过认真的研究^⑪,结合他们的研究,我们认为,位于东北地区北部范围内的遗址数量十分有限,可见当时的人口数量是十分有限的,数量不多的人口对于食物资源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当时遗址周围的动植物资源可以满足一定数量的人口需求,加之这个区域的冬季十分寒冷,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发展,这些因素可能都是当时这个区域新石器时代的生业活动以采集和渔猎为主,文化发展进程十分缓慢的原因。而位于这个地区南部范围内的遗址数量相比北部地区要多,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明显要优于北部地区,当农业活动开始出现之后,一旦人口数量的增加与遗址周围的动植物资源的供给能力发生冲突时,为保证文化的延续,人们只能有意识地通过扩大农业活动获取食物,这样做,很可能又为促进人口增加奠定了基础,迫使当时的人群进一步扩大包括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生产。这个过程自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表现的尤为明显。

另外,我们还要重视的一点是位于东北地区北部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中,尚未发现受到生业特征为农业生产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与此相反,在位于东北地区南部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中,红山文化就受到位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小珠山中、上层文化也受到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影响。在整个先秦时期,由黄河流域地区向西拉沐沦河流域为主的区域的文化影响过程几乎没有中断^⑫。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也是这个地区的生业逐步形成农业生产特征明显的原因之一。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到战国时期,西拉沐沦河流域被纳入燕国的范围,燕国属于战国时期的燕代经济区,其经济特点是畜牧业发达,多马、牛、羊等畜产品,农业则比较粗放,是个半农半牧区^⑬。这与我们在研究中发

现的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以来,当地以种植粟和黍为主,饲养牛、羊和马的数量较多,畜牧业比较兴盛的状况是比较一致的。从这点看,当时可能存在西拉沐沦河流域的文化与位于燕山南麓地区的燕文化进行互动的过程。

五、结论

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即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比重逐渐增加,但其具体发展状况尚有待于研究;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个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的影响有关。这个特征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距今约7000年以来,逐步形成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以家猪占绝大多数)为主的生业模式相比,区别是比较明显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由于在20余处遗址中科学地开展动植物考古研究,在填补空白、积累资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面对上述东北地区八个区域内的多个文化和诸多遗址,我们现在的探讨仅仅是起步。在以往发掘的诸多遗址中失去的动植物遗存资料已经不可能再找回了,进一步研究无从谈起。我们寄希望于从现在开始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田野发掘中努力收集相关动植物遗存,在做好动植物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本文提出的观点进行更加科学的探讨和反思。

由于对这个地区的生业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因此本文没有对生业状况与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11&ZD183)和201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共同资助。

注释:

a. 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第339-354页,第327-339页,第312-32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b. 赵宾福:《东北考古学研究(一)》,第343-360页,第256-289页,第198-220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⑬⑭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第381-384页,第354-370页,第274-286页,第286-310页,第159-273页,第327-383页,第435-44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⑮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第515~5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b. 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⑯Grawford:《白金宝遗址的植物遗存》,张忠培主编,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著:《肇源白金宝》,第277~27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⑰陈全家:《白金宝遗址(1986年)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04年第4期。

⑱⑲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⑳陈全家:《农安左家山遗址动物骨骼鉴定及痕迹研究》,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第57~71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年。

㉑傅仁义:《平安堡遗址兽骨鉴定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㉒a. 刘玮、赵志军、霍东峰、朱永刚:《内蒙古库伦旗三家子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 b. 赵莹、刘志鹏、霍东峰、朱永刚:《通辽市库伦旗三家子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草原文物》2014年第2期。

㉓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马城子》,第21、88、114、147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b.《洞穴墓葬动物骨骼鉴定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马城子》,第308~311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㉔傅仁义:《大连市北吴屯遗址出土兽骨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㉕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㉖吴清云:《大嘴子遗址炭化稻米的考察与研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连考古文集(第一辑)》,第

189~193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⑳傅仁义:《大嘴子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见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大嘴子》,第285~290页,大连出版社,1999年。

㉑㉒㉓a.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第188~199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b.农业研究课题组(赵志军执笔):《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农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第1~3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㉔㉕汤卓炜、郭治中、索秀芬:《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白音长汗》,第546~57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㉖王育茜、吴文婉、辛岩、靳桂云、王海玉:《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㉗孙永刚、赵志军:《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㉘黄蕴平:《牛河梁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第507~510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㉙㉚赵克良、李小强、尚雪、周新鄂、孙楠:《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植物学报》2006年第44卷第6期。

㉛农业研究课题组(赵志军执笔):《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与经济研究——农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第1~3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㉜孙永刚、赵志军、曹建恩、孙金松、党郁:《内蒙古二道井子遗址2009年浮选结果分析报告》,《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

㉝㉞㉟㊱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㊲王丹、姚正权、王昌燧、胡耀武:《上机房营子遗址的植硅体分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第~218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㊳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㊴a.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b.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第43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㊵李水城:《西拉沐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

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9~288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㊶a.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b.席永杰、滕海键、季静:《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述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2卷第5期。

㊷赵济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第188~20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㊸a.杨永兴:《小兴安岭东部全新世森林沼泽形成、发育与古环境演变》,《海洋与湖沼》2003年第34卷第1期; b.杨永兴、王世岩:《8.0kaB.P.以来三江平原北部沼泽发育和古环境演变研究》,《地理科学》2003年第23卷第1期; c.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㊹a.滕海键:《燕北暨西辽河流域史前经济形态及其演变态势》,《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 b.李水城:《西拉沐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9~288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㊺李水城:《西拉沐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9~288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㊻a.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第219~25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b.李水城:《西拉沐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9~288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c.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㊼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第308~31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